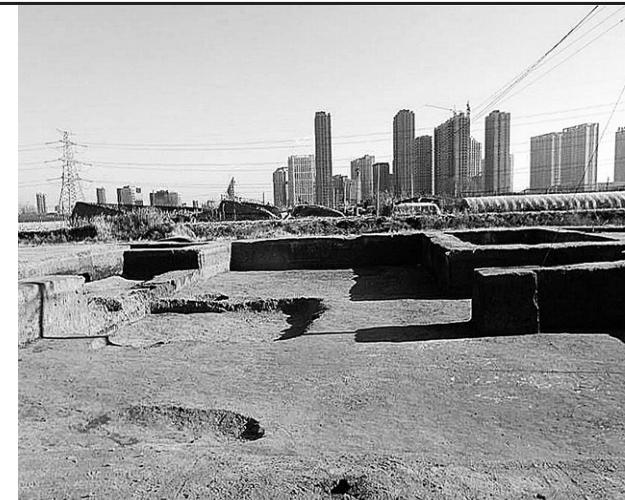


老地方



青桩子古城遗址发掘现场



青桩子城古墓

◎ 专家推断 青桩子古城早于候城诞生

1993年,在沈阳故宫北墙外,发现了“候城”遗址。专家们认为,西汉时期,候城属于辽东郡,应是沈阳最早的名字,是沈阳建城的起点。如今,沈抚新区内发现的青桩子古城竟呈后来居上之势,有何凭据?为此,王绵厚阐述了以下四个观点:

其一,候城名称应源于“障堠(hòu,古代瞭望敌方情况的土堡)之城”,即《汉书》所注:“汉制,每塞要处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汉书》中记载的“汉制”,从“汉承秦制”的文化传统分析,汉应是继承了燕秦之制,故今沈阳地区真正的“障堠之城”,其早期中心,不应在地无山川屏卫的旧城内“宫后里”(候城),而应在附近有大量出土文物,北有小辽水(浑河)之堑、南北又有早期燕秦汉墩台连线的东陵区上伯官屯东的“青桩子”古城。

除在青桩子古城外,附近还有抚顺李石寨镇高扬村和高湾村等多处战国秦汉遗址,故有理由推证,东陵区上伯官东青桩子一带,应是“候城县”设立前“秦开却胡”后燕秦汉辽东郡“中部都尉”治的最初地点,其周边包括抚顺刘尔屯、李石寨一带的大量战国和汉代史迹,都应与早期辽东郡“中部都尉”的镇城有关。

其二,由考古发现可知,在沈阳东上伯官屯至青桩子、刘尔屯一带,特别是青桩地和刘尔屯之间的数公里的浑河沿岸,围绕青桩子古城为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上伯官屯东秦始皇“廿六年”刻款的陶量、刘尔屯战国“燕式戈”和“相邦吕不韦造”铭文铜矛等多件燕秦铜器出土,其时间延续燕、秦、汉三代,这是浑河沿岸集中发现、有明确记年的、在一地连续出现的燕秦汉三代的重要考古遗存,为辽海其他地区所罕见。

其三,由上述考古现象进一步分析,于青桩子古城出土的秦始皇“廿六”刻字陶量,或为当时燕秦戍军屯边驻营牤牛河岸时遗失;或为当时启筑“中部都尉”镇城时,为戍边将士颁发军粮所用。20世纪90年代,在与青桩子古城紧傍相邻的抚顺李石寨,又发现了刻有秦代铭文的“相邦吕不韦”铜矛。这件铜矛不是一般普通兵士携带的兵器,当与戍守辽东郡“都尉重镇”(青桩子古城)的高级将领的活动直接有关。据此可以推断:青桩子古城出现的时代,至少不会晚于秦。由出土于刘尔屯的战国铜器,可以推测出该城应在公元前3世纪“秦开却胡”以后的燕昭王时代,作为辽东的“障堠之城”,在“候城县”设置前,即已建于浑河南岸。从历史的因果关系看,青桩子城的启建时间显然应早于沈阳旧城内的秦汉辽东郡之“候城县”。

其四,以青桩子古城与宫后里古城(候城)的出土遗物相比,二者的时代和功能差别可见端倪。候城遗址也发现了少量战国陶片,但迄今尚未有记刻准确年代的文物出土,而青桩子古城周围则发现了战国铜器、秦始皇“廿六年”陶量、秦相吕不韦的铭文铜矛及其周边的早期烽燧址、战国燕刀币等文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青桩子古城,还出土了“都官”瓦,都官即都尉,是战汉时期的郡国军事长官,这些发现都为青桩子古城的时代及高等级的军事功能性质提供了明确的历史标志。可以说,即使候城始设于战国,也应在辽东郡“中部都尉”障城(青桩子古城)的基础上。

王绵厚表示,燕国初创辽东郡时,或郡下无县的定数,而且当时郡下城邑多称“都”,如辽西朝阳南十二台营子的汉代“柳城县”址,即出土有早于汉柳城县的战国“西(yù)城都”陶铭。说明在“柳城县”之前的战国(燕)时,并无县制而先称“西城都”,至秦定天下三十六郡后,方确定郡县体制。如是,则辽东郡“中部都尉”(青桩子城)与“候城县”(宫后里)的先后关系,亦应如辽西郡“西城”一样(先有“西城”后有“柳城县”),先有“青桩子”,后有“候城县”。

“当然,沈抚地区从辽东郡‘中部都尉’镇城到‘候城县’的建置,必然有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演变过程,但二者的关系,应是先有燕秦汉‘中部都尉’(青桩子古城)的障堠之城,后有‘候城县’(宫后里)。此外,秦汉时期的郡国‘都尉’,秩比二千石,其职位和重要性远高于县令(六百石)。所以对沈阳地区‘中部都尉’故址的考定,对研究沈阳城市史和沈阳历史地位的确立,关系尤重!”王绵厚评论道。

2013年4月4日,清明时节,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资深考古学家王绵厚与肖景全、张福有等人下乡考察。在沈阳市东陵区上伯官屯以东、牤牛河东岸的“青桩地”(今沈抚新城区内),时值有关部门在遗址南北开挖公路基槽,长几百米、宽几十米的路沟断面暴露出明确的古文化层,其时代特征鲜明的出土文物,立刻引起三位学者的高度关注。次日,王绵厚即电告省文物局有关领导,请沈阳有关部门予以保护。4月7日,辽宁省文物局和沈阳市文物局接到报告后,又特邀王绵厚与省文物保护专家郭大顺、田立坤和沈阳市的孟凡涛、刘焕民等同志,再赴现场进行考古勘查和保护论证,大家一致认定该发现的重要性。王绵厚认为,这座青桩子古城始建于战国(燕)时期,其创建年代比现今沈阳市内的候城还要早,是沈阳地区迄今发现的时代最久远的古城,乃沈阳建城史之源头!

浑河岸畔青桩古城 书写“沈阳前传”

◎ 古城断代 燕长城遗迹再补实据

关于青桩子城的断代问题,除了要看古城的出土文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不可忽略:战国燕长城是否经此地。

现存的燕长城以石墙为主,并与土墙、山险、河险相结合,具有“因塞制险”的特点和军事防御的特征。燕长城辽东段的走向为:从阜新市的彰武县出境后,进入沈阳市所属的新民北部地区,然后东行经铁岭市的镇西堡、龙首山,折而南下过新台子镇邱台子,复又进入沈阳境内,在沈阳市大体沿今沈(阳)——铁(岭)高速公路一线,即新城子区和东陵区东部的矮丘一带南北通过,然后抵浑河北岸,在东陵区高坎镇附近跨浑河,经东陵区上伯官进入抚顺市顺城区的李石寨镇,再经刘尔屯、四方台、抚顺县大南乡东台,越东陵区深井子镇鄂家沟进入抚顺县拉古乡,然后南行过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清寨的和顺、关台沟一带复又进入抚顺县的海浪乡,接着进入本溪市,经张其寨乡下翻身村、黄木厂诸地,沿太子河支流的威宁营河南下,过高台子,至威宁营遗址,再沿太子河东进,至本溪水洞、通江峪后,又经上堡、赛梨寨、刘家哨、赵甸、由马城子(明一堵墙堡)附近跨过北太子河,转而沿南太子河下行,经南甸、九龙口,至碱厂。其后继续沿南太子河下行,过兰河峪(明设兰河峪墩)、新城(明孤山新堡)、孤山(明孤山堡)、过城门村,入凤城境,经叆阳、灌水、双山子、红石砬子、大西岔乡,直抵鸭绿江边的秋(首)果壁……秦灭六国后,沿用了燕国五郡与这条燕北长城。

由此可知,青桩子古城恰在这条燕北长城东段的途经区域,四方台至拉古河一线不断发现的长城遗址、拉古大台子等烽火台、及沿线不少与长城相关的村镇地名,即为明证。有邻近的燕长城做注脚,青桩子古城乃燕国边城之说,便有了更为确凿的实据。



青桩子城址省级文保碑

◎ 古城职能 防「貊」甚于防「东胡」

青桩子古城,居辽河平原与辽东山地的结合部,东西向,浑河襟带,南北向,岗丘屏围,西控辽河平原,东扼浑河古道交通要冲,实乃兵家必争之地。不过,这座战汉时代军事要塞的地理位置已抵近辽东山区,而无论是与燕国为敌的东胡,还是被秦国视为心腹大患的匈奴,皆来自北方或西北方,这似在暗示后人,青桩子驻军的盯防重点在东不在北。那么,在当年的青桩子城东向,真的存在与中原王朝敌对的国家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国家,史书称之为“貊”(mò,也写为“貉”),指中国古代东北方的民族,建立貊国的民族是濊(huì)貊族。

濊貊族在夏商之际广泛分布于南起朝鲜半岛北至松花江流域中游的广大地区,其主体在中国东北,后被汉四郡故地的女真人所同化,成为女真族的组成部分。早在西周时期,貊国就是周王朝的臣属国;春秋时期,齐桓公曾发动对濊貊族的战争;战国时期,濊貊族从事农业和渔业,过着定居生活,黍是濊貊人的主要食粮。后来在东北地区建立政权的扶余等政权,就是在融合濊貊等东北区域民族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战汉时期的濊貊人与燕人关系密切,习俗上与燕国相近,称之为燕毫(bó)。貊国之东还有商朝王室箕子东迁后留下的势力集团,商朝被周灭亡后,末代商王帝辛(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带五千人东迁,所建之国史称“箕子王朝”,箕子后人被中原王朝封为“朝鲜侯”。

在燕国的北部边境,除了劲敌东胡外,还有两大敌国对其心怀不轨:貊与箕子国。而所谓的“秦开却胡”,则是对此三家的捆打,只不过征东胡在先,伐貊与箕子国在后。

对貊与箕子国的两大战争,在史书中均有明确记载。《山海经·海内西经》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燕灭之。”;《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载:“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两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故而,关于“秦开却胡”的完整表述,应是:逐东胡、灭貊国、弱箕子国。秦开为燕国的“拓地千里”,不仅要从纵向看,还要从横向看。

不过,燕国虽豪跨千里之地,但如何消化却成难题,对大量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若不设要塞、驻重兵予以监视、弹压,难免不反叛迭起,地面震荡。青桩子古城设置在这一要害位置上绝非偶然,可以说,其创设初衷,防“貊”甚于防“东胡”。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张松 文并摄